

# 也谈王统照《山雨》的主题思想

刘为钦

**【提要】**有学者认为,要重视《山雨》的反帝爱国思想。实质上《山雨》不过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泛抗战叙事作品。中国20世纪关涉了抗战史实的长篇小说,存在两种形态,即抗战叙事和泛抗战叙事。但完整而深入的抗战文学研究,也不能忽视对《山雨》等泛抗战叙事文本的抗战元素和反日情绪的研究。

**【关键词】**《山雨》 主题 泛抗战叙事 爱国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2-0115-06

何为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这也是一个长期困扰笔者从事抗战文学研究的问题。以王统照的《山雨》为例,学术界过去一直以为是一部农村题材的作品。<sup>①</sup>然而,冯光廉、刘增人在其合作撰写的《〈山雨〉研究商兑》一文中强调,“要重视小说的反帝爱国思想”;<sup>②</sup>刘增人在其《〈山雨〉新论》一文中认为,中华民族的空前灾难,“也是贯穿全书的宗旨”。<sup>③</sup>冯光廉、刘增人所说的“帝”,主要是指日本;那么,《山雨》又是否属于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以反日爱国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山雨》所叙述的具体内容说起。

小说的主人公奚大有与驻扎在镇上的士兵发生口角,被抓住关了起来,奚大有的父亲奚二爷请陈庄长出面,花了五十大洋,才把他赎出来。第二年大旱,村子里的人祈雨,遭遇土匪的袭击,奚大有在枪战中受伤。奚大有的伤治好之后,过境的军队又逼迫村民们用推车去

护送。奚大有趁值勤的士兵不注意,和徐利一起溜了出来。回到村子后,奚大有大病一场,还要带病参加官府摊派的修路事务。不久,又有一支溃败下来的军队进驻陈家村,滋扰得村民不得安宁,陈庄长托镇上的吴练长说情,花了一万六千大洋把这批败兵打出门。在陈家

① 孙克恒说:《山雨》“集中地,概括地反映了北伐前后在资本主义与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肆无忌惮地剥削、榨取下,中国农村和广大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于大批破产的苦难历程,表现了农村中成长的第二代的不同的命运和生活道路”(《谈〈山雨〉的现实性与艺术创造》,《前哨》1959年第6期)。田仲济说:“这是描写旧时代中国农民较结实的一部长篇。”(《王统照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王统照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8页)金梅说:《山雨》是“一部描写旧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谈王统照的长篇小说〈山雨〉》,《齐鲁学刊》1980年第3期)。吴松亭、周劲馨说:“小说《山雨》描绘的是北伐前后北方农村衰败、崩溃的情景”(《试论〈山雨〉的现实主义成就》,《王统照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2页)。

② 冯光廉、刘增人:《〈山雨〉研究商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③ 刘增人:《〈山雨〉新论》,http://blog.sdnews.com.cn, 2008-12-10。

村实在呆不下去了，奚大有带着妻儿来到 T 岛，在朋友杜烈的帮助下，做起卖水饺、扛码头、拉洋车的活计。从儿子口中得知，徐利因纵火焚烧吴练长的宅院被官府逮捕，奚大有第二天乘火车赶回陈家村。此时的陈家村，陈庄长含恨身亡，徐利被官府处决，萧达子被地主赶出家门，宋大傻落草当了土匪，已经是物是人非。参加完陈庄长的葬礼，奚大有回到 T 岛，又目睹了日本军人焚烧报馆的惨状。

不可否认，《山雨》有着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特别是小说的结尾处，面对日本人的纵火，杜烈喊出了“有本事，叫大火毁灭全中国”，杜英喊出了“不，烧吧！烧吧！烧遍了全世界”，更是把这种情绪推向高潮。小说不仅在结尾部分抒发了反日爱国的情感，而且在整个叙述中也不时流露出对日本，乃至一切帝国主义的不满。在小说的开篇，陈庄长在谈论了一阵不堪重负的苛捐杂税之后，他的“一点灵敏的回忆骤然使他的脑力活泼起来”，“噢！想起了，这些事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sup>①</sup>

陈庄长的这个“新鲜的解答”很有效力，地窖里十多个人的思绪都被“引到了更远更大的事情上”。平常与陈庄长“说话不很合得来”的奚二爷也记起了“他与那时的青年农人抗拒德国人修铁路的一幕悲壮的影剧”。自从修建铁路之后，机关车、电线杆、枪、小铁丸、纸烟、洋油炉、洋油灯、玻璃器具、外国人、洋学生都随之而来。奚二爷用右手拍了一下大腿说：“是啊，这都是由于外国鬼子作弄的！”<sup>②</sup> 宋大傻也说：“这些年鬼子作弄了人，当官的，当兵官的，却更比从前会搂了。”<sup>③</sup>

陈庄长对时局的判断与分析，不仅获得了小说中人物的赞同，也得到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评论家的喝彩。冯光廉、刘增人据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而封建地主阶级则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封建经济，随之而来的便是政局的动荡，兵灾的加剧，土匪的蜂起，苛税的增多。……这一系列日益深重的灾难，接连不断地降落到农民头上，‘活不下去了’，‘非另打算不行’，便成为

必然的结论。《山雨》对奚大有和他的乡亲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正是放在帝国主义侵入这个总背景、总根源下展开描写的。”<sup>④</sup> 冯光廉、刘增人也是将帝国主义的入侵视为奚大有和乡亲们受苦的“总根源”，把帝国主义的入侵当作《山雨》展开描写的“总背景”。

从人物语言可以推导出作品的思想内涵；但只从人物的只言片语来判断作品具有某种观念、某种意识，那也容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冯光廉、刘增人只是注意到了陈庄长这句富于感染力、刺激性议论的表层含义，而忽略了对这种意见全面性的审视，忘记了从整体上来提炼作品的主题。赞同陈庄长这种意见的奚二爷还说过：“陈大爷，你这算一针见血！鬼子修铁路，办教堂，是一回事。对于咱们从根就没安好心。办学堂也是跟他们一模一样地学，好好的书不念，先生不请，教书的还犯法。可是打鼓，吹号，戴眼镜，念外国书，——譬如镇上，自从光绪二十几年安下根办学堂，现在更多了。识字，谁还不赞成？不过为甚么非改学堂不可？本来就不是好规矩；学堂是教员站着，学生却老是坐着，这就是使小孩子学着目无大人的坏法子。所以啦，那些学生到底出来干甚么？”<sup>⑤</sup> 这是明显地对现代新兴教育制度的偏见！——连教员站着，学生坐着的授课方式也进行了指责。将中国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全然归罪于外来文化和外来资本，恐怕是当时的一种风潮。王余杞的《急湍》中人物李肥指着“仁丹”、“哈德门”的广告对人说：“让你们挨饿的就是它们！”<sup>⑥</sup> 这也正如鲁迅所说：“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

①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 1933 年版，第 7 页。

②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 1933 年版，第 8 页。

③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 1933 年版，第 9 页。

④ 冯光廉、刘增人：《〈山雨〉研究商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3 期。刘增人在其后来的《〈山雨〉新论》中仍然持着这种观念。

⑤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 1933 年版，第 10 页。

⑥ 王余杞：《急湍》，上海联合出版社 1936 年版，第 113 页。

而且排斥的”。<sup>①</sup>但《山雨》中另一个人物肖达子有着不同的说法：“奚二叔，话不要尽从一面讲，学堂也发富了一些人家呢。”肖达子从功利的角度对奚二爷进行反驳，缺乏一定的说服力，但奚二爷对外来文化、外来技术、外来资本的全盘否定，将中国社会自身的病症也归咎于外国人的修铁路、办学堂，未免夸大了外来资本入侵的威力，这只能算是一种狭隘的带有小农意识的判断。即或陈庄长自己也意识到：“……人要随时，你一味家想八辈子以前的事，还好干甚？宣统皇帝都撵下了龙庭，如今是大翻覆的时代。看事不可太死板了。闷在肚子里动气，白费！——我就不这样。小孩子到了年纪愿意上学堂，随他去吧。私学又不准开，只要来得及，也许混点前程。”<sup>②</sup>既然陈庄长自己都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大翻覆的时代，人要随时，不能一味地想八辈子以前的事，那么，我们还能将“这些事都是由于鬼子作弄的”这句话视为《山雨》立意的基础吗？比较耐人寻味的是，《山雨》的作者王统照在文本的叙述中也是将这种议论视为“无端绪的谈话”。<sup>③</sup>

## 二

仅仅根据文本之中一句连作者自己都不完全认同的人物语言，冯光廉、刘增人把帝国主义的侵入视为中国社会病症的“总根源”，把帝国主义的侵入视为《山雨》叙事的“总背景”，这未免有一点太草率了。冯光廉、刘增人的这个结论曾引起过学术界的关注，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高玉启近期还说：“《山雨》所运用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体）具有民族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性质。”<sup>④</sup>不过，杨洪承似乎并不满足于这种论断，他则企图从“现代叙事空间”的角度找寻答案。<sup>⑤</sup>这也正好暗合了文学理论界“不同的读者对其主题却往往有不同的看法”的认知。<sup>⑥</sup>但我们认为，从文本的叙事整体来看，《山雨》的主题思想还是王统照自己所说的：“意在写出北方农村崩溃的几种原因与现象，以及农民的自觉。”<sup>⑦</sup>

具体而言，1930年前后山东农村衰败的原

因，有天灾，亦有人祸。第一年，先是发生蚂蚱虫灾，立秋后又下一场暴雨，收成减少了一半。第二年，从四月到六月只下了几场小雨，一片片土地裂出龟纹，一切的幼苗几乎都被干死。可是，面对持续的自然灾害，地主并没有减少地租，肖达子因为交不起租子，被李家地主驱逐出门。土匪还是照例光顾，在陈家村祈雨的时候，土匪发难，还与村民发生枪战。官府反而增加了各种捐款和税收，镇上的吴练长靠克扣税收，过着奢华的生活。县里的陈葵园靠各种捐款，购置了大量的地产，还娶了几房姨太太。村民们还被一拨又一拨过往军队抢夺骚扰。

自然，外来商品，特别是日本企业的介入对山东经济造成挤压；日本军人手持地图对T岛进行勘测，是对中国领土的覬覦；日本军舰开到T岛后海，是对中国军队的挑衅；日本暴徒焚烧中国报馆，更是对中国人民尊严的践踏。那么，中国社会诸多不合理的现实是不是由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军队的入侵而引起的呢？小说中的人物杜英也有一种说法：“你以为日本兵不来，那些这一队那一队的乱军队不敢自己在地方上为王？”<sup>⑧</sup>同样地，小说人物的语言不足为据，但纵观中国社会的历史，即使是在没有外国人入侵的情况下，哪一个时代的官不贪，兵不抢，匪不盗，地主和资本家不凶狠呢？这也就是说，当时山东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来资本的输入只是原因之一，而不是原因的全部，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当时中国社会图景的一种颜色，而不是主要色调，反战

①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5页。

②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1页。

③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2页。

④ 高玉启：《〈山雨〉新论》，《文教资料》2009年第18期。

⑤ 杨洪承：《现代中国小说的叙事空间——由重读王统照长篇小说〈山雨〉谈起》，《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

⑥ 陈文忠：《文学理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⑦ 王统照：《山雨·跋》，《山雨》，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369页。

⑧ 王统照：《山雨》，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298页。

抗日情绪只是《山雨》复杂情感的一缕，而不是《山雨》的主题思想；《山雨》不过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叙述旧中国农村生活的小说。<sup>①</sup>

以抗日战争为叙事背景的《山雨》，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个案，钱钟书的《围城》在这方面就与《山雨》有着异曲同工的妙趣。方鸿渐所乘的法国邮船还在印度洋上航行，船上的中国留学生就在谈论祖国的“外患内乱”，“都恨不得立刻就回去为它服务”。船到上海，便从无线电波中得知，尽管上海还没有发生战事，但中日关系已经“一天坏似一天”。上海战争刚一爆发，周经理就拍电报给方鸿渐，要方鸿渐赶回上海；方鸿渐回上海，住进了周经理在法国租界里的寓所。方鸿渐一行在宁波港上岸，突袭的警报不断响起；沿途逃难的人群密如蚂蚁，汽车上更是拥挤不堪，还不时传来长沙吃紧的消息。到了湖南平成“国立三闾大学”，校长也在训导学生，要经常想想在国家抗战时期“应当怎样报效国家社会”。后来，方鸿渐绕道香港回到上海，此时欧洲的形势更糟，日本人在上海“一天天的放肆”。《围城》也是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叙事作品。

《围城》中的人物董斜川吟有“直疑天尚醉，欲与日偕亡”的诗句。<sup>②</sup>他也表达出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小说对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有过这样一段叙述：“开战后第六天日本飞机第一次来投弹，炸塌了火车站，大家才认识战争真打上门来了，就有搬家到乡下避难的人。以后飞机接连光顾，大有绝世佳人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风度。”<sup>③</sup>这段叙述对日本飞机的轰炸无不带有无奈的痛惜和含泪的揶揄。比较而言，激越、明朗是《山雨》的作派，含蓄、深沉则是《围城》的风格。《围城》第九章对当时的战争状况还有过深刻的剖析：“这一年的上海和去年大不相同了。欧洲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人因此在两大租界里一天天的放肆。后来跟中国‘并肩作战’的英美两国，那时候只想保守中立；中既然不中，立也根本立不住，结果这‘中立’变成只求在中国有个立足之地，此外全让给日本人。‘约翰牛’（John bull）一味吹牛；‘山姆大叔’（Uncle sam）原来只是冰

山（Uncle sham），不是泰山；至于‘法兰西雄鸡’（Gallic cook）呢，它确有雄鸡的本能——迎着东方引吭长啼，只可惜把太阳旗误认为真的太阳。美国一船船的废铁运到日本，英国在考虑封锁滇缅公路，法国虽然还没有切断滇越边境，已扣留了一批中国的军火。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鼓吹‘中日和平’的报纸每天发表新参加的同志名单，而这些‘和奸’往往同时在另外的报纸上声明‘不问政治’。”<sup>④</sup>这一分析也显露出叙述者对当时世界格局和社会现实的思考，字里行间也隐含着对民族命运的担忧。那么，我们又是否可以将反日爱国视为《围城》的主题呢？显然不能！《围城》主要还是描写方鸿渐、赵辛楣等一批知识分子的冷暖人生，其主题也还是钱钟书所说的：“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sup>⑤</sup>

其实，在世界文学画廊中也有类似以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展开的叙事。美国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的《小妇人》（Little Women），创作于1868年，其时是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小说以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马奇太太一家的生活，未曾涉及对南北战争的具体评价，表达的却是爱与助人的主题。

### 三

与王统照、钱钟书不同，萧军则明确地说：他的《八月的乡村》，“是在反‘日’，反‘帝’，反对人类的残害者呢！”<sup>⑥</sup>《八月的乡村》一开始

① 本文所指的“抗日战争”是从“九一八事件”算起，见拙作《抗日战争起始时间考辨》，《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②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98页。

③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④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325页。

⑤ 钱钟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⑥ 萧军：《八月的乡村·书后》，《萧军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就讲述萧明带领的小分队从敌人那里逃离出来后的撤退；接着，书写铁鹰队长带着义勇军袭击日军供应军需物资的火车，义勇军与日军在黄家堡子展开的拉锯战；最后讲述主力部队撤离到东安，李三弟指挥小分队在撤离过程中与日军展开的鏖战——通篇都是以“中华人民革命军第九支队”的战斗历程为施事对象。诚然，小说也写到义勇军在龙爪岗对王三东家夫妇的惩处，写到唐老疙瘩与李七嫂、萧明与安娜的情感生活，但对王三东家的惩处，陈柱是将其视为抗日斗争的障碍，对唐老疙瘩与李七嫂、萧明与安娜情感生活的描写，是为了表现抗日战士与生俱来的人类情感和自然秉性。一般认为，“主题”即是“贯穿于全篇的基本思想”<sup>①</sup>“核心意蕴”。<sup>②</sup>那么，《八月的乡村》应该也是比较标准的以抗日战争为题材，以反日爱国为主题的长篇叙事。

关于文学作品主题思想的研究，韦勒克、沃伦检讨为两种状态：一种是否定文学作品与思想主题的任何关系；一种是尽管厌倦了这种评价方式，“但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哲学论文来处理的议论仍旧存在着”。<sup>③</sup>我们认为，孤立地研究单个文本的主题思想，其意义不大；但整体地研究某一时期、某一题材的文学，对作品主题思想的解读有利于准确把握作品的深层内涵，有利于梳理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以抗战为题材，以反日为主题的叙事作品是明显地区别于《山雨》、《围城》的。一般来说，以抗日反帝为主题的叙事，主要是描写人物的抗战生活，突出反帝爱国的思想主题，其它叙事元素不过是其辅助的内容；而以抗战为背景的叙事，则主要的不是描写抗战生活，不是表达反帝抗日的思想情感，文本在呈现抗战背景的同时或许也流露出某种反日情绪，但这种情绪在文本之中不过是居于次要地位的思想内容。“九一八事件”后，及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中国文坛曾出现过一批以抗战反日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如张个依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演义》、铁池翰（张天翼）的《齿轮》、林箐（阳翰笙）的《义勇军》、李辉英的《万宝山》、周楞伽的《炼狱》、谷斯范的《太湖游击队》（后更名为《新水浒》），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白

刃的《战斗到明天》、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马识途的《清江壮歌》、艾煊的《大江风雷》等。它们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即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奉献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形态，也为20世纪的历史学、军事学、社会学平添了丰富的文献史料。

当然，不同的作家，不同的文本，对抗战史实的触及，其程度和方式是不尽相同的，这也很自然地导致了一批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的出现。以抗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除了《山雨》、《围城》之外，还有《淘金记》（沙汀）、《北极风情画》（无名氏）、《风云初记》（孙犁）等。如果认真盘点一下“九一八事件”之后关涉抗战史实的长篇小说，不难发现，还有一种在漫长的历史叙述中点击了抗战事迹的叙事，如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sup>④</sup>师陀的《马兰》、靳以的《前夕》、张孟良的《儿女风尘记》等。《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讲述丁家二百多年的发家史，直到小说结尾的一章，才写到人们听到遥远的地方传来隆隆的炮声，从外地回来的人带来了日本人占领营口的消息，于是，各种名目的土匪开始实施对商铺和有钱人家的抢劫。如此道来，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上便出现了抗战长篇小说（即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与泛抗战长篇小说（即以抗战为背景、或少量篇幅触及了抗战生活的长篇小说）相区别的存在；由此还可以推导出，抗战小说与泛抗战小说、抗战诗歌与泛抗战诗歌、抗战散文与泛抗战散文、抗战戏剧与泛抗战戏剧、抗战文学与泛抗战文学的分野。

将《山雨》视为以抗战为背景的泛抗战叙

- ① 陆梅林主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页。
- ② 陈文忠：《文学理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 ③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 ④ 《科尔沁旗草原》（第一部）于1933年在天津写成，1939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端木蕻良1943年应王鲁彦之约撰写《科尔沁旗草原》第二部，仅写五章，后因多种原因而终止。这五章也未涉及抗战内容。

事,并不是否定《山雨》所具有的反帝爱国思想。如前所述,《山雨》也存在浓厚的反日情绪。试想,在民族国家处于危难的关头,王统照在文本的叙述中涉及了中日战争的话题,他能不表达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伤与激愤吗?关于《山雨》的写作,王统照曾有过这样一个说明,他原来准备撰写两部作品,一部是《山雨》,还有一部是以济南“5·3惨案”为背景,写日本兵的矛盾心理。王统照将自己的写作计划告诉叶圣陶,得到过叶圣陶的支持。关于日本士兵矛盾心理的作品写了九万多字,上海“1·28战争”爆发,王统照“不愿继续写下去”,<sup>①</sup>改变初衷,转而创作《山雨》——在这样的情境之下书写的《山雨》,自然少不了反日爱国的情结。然而,我们也不能过分抬高和夸大《山雨》的反日情感。冯光廉、刘增人尽管只是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中国北方农民遭受苦难的“总背景”、“总根源”,并没有说“反日爱国”就是《山雨》的主题思想,但他们的论断已经超出了文本叙事的客观事实。冯光廉、刘增人还说:“《山雨》最早地喊出了反帝抗日救亡的呼声。”<sup>②</sup>而中国文学界在《山雨》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一批以抗战为背景,甚至以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山雨》1933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通俗小说家张个依的《民族英雄马占山将军演义》则已于1932年7月由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仅在长篇小说的范围之

内,最早喊出抗日救亡呼声的也不是《山雨》。

以《山雨》为代表的泛抗战叙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自然包含了部分时代信息、抗战元素和反日情绪。但是,泛抗战叙事正因为只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它展示了比抗战小说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更为复杂的人类情感,形成了有别于抗战叙事的文学范式。我们将泛抗战叙事与抗战叙事区别开来,并不是刻意地要将泛抗战叙事排斥于抗战文学的研究之外;相反,真正全面而深入的抗战文学研究也应该正视《山雨》等文本的泛抗战叙事体式的存在。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抗日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流变(1931~1966)》(批准号:09BZW05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马光

① 王统照:《山雨·跋》,《山雨》,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369页。

② 冯光廉、刘增人:《〈山雨〉研究商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 Also Talking about the Theme of *ShanYu* of Wang Tongzhao

Liu Weiqin

**Abstract:**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patriotic thoughts of *ShanYu*. But *ShanYu* is a universal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works whose background i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re are two kinds of form in the novels regarding to the history of Anti-Japanese war, that is, the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and the universal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However, if we study literature on Anti-Japanese war completely and deeply, we could not ignore the study of resistance elements and anti-Japanese sentiment in universal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texts such as *ShanYu* and so on.

**Key words:** *ShanYu*; theme; universal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patriotic thoughts